

在技术时代里我们如何重返自由？——论经典与经典阅读

熊跃根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善与恶是人类世界道德生活永恒的话题。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先知苏格拉底耐心地告诉格劳孔“一切能毁灭能破坏的是恶，一切能保存有助益的是善”。后来，亚里斯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则进一步明确指出，人类生活形式主要包括追求享乐的物质生活、社会政治生活和沉思的生活，而伦理学的核心就是从善的目的出发，诠释日常生活的价值，思考人生的意义。

千百年来，人类追求物质与享乐的步伐从来没有停止过，它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因。同时，这一发展历程的意外后果是，物质文明在一定程度上使人类陷入困境，而这正是历史的症结所在。今天，即使最雄辩的哲学家也无法回避技术时代里人所遭遇的困境，一方面技术在极大拓展了人类探索世界与丰富精神生活的同时，另一方面也越来越将人制约在技术理性的牢笼中。

人类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探索未知世界的强烈好奇心，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和大学制度的形成，而科学的发展，又通过推动人类理解力的发展进而丰富人类实践知识与理性的发展。随着理性化的发展，人自身对理性化的不满日益增加，也就使得人类自身在追其自由的同时又以新的方式给自由套上枷锁。作为他那个时代里一位最有影响力、也是最具争议色彩的哲学家与社会理论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的关于自由的命题不仅指出了人类社会的双重困境，也从历史的角度揭示了每一个时代里，人性解放面临的难题。当下在物质极大丰裕、技术日益复杂的时代里，对自由问题的追问依然是知识分子和社会科学研究者不能自行解脱的任务。

在网络日益全面侵入日常生活，在通讯手段变得日益迅捷，当世界日益变小且越来越扁平化，作为人类需要再度思考的问题依旧是：人是否可以获得自由？在技术时代里，如果我们正在丧失某种自由，未来我们是否可以重返自由？

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遗产，古代先贤与后世思想家的经典著作不仅为我们打开了通向历史的通道，而且阅读经典也帮助人们在某种意义上消弭了个体在遭遇自由困境时的内心冲突。所有现代性的困境都出现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人们对历史质感的把握通过对理性和理性化的质疑得以实现，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人类历史上从未间断的为技术和技术主义奉献的种种浅薄的赞歌。

当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道出“生存还是毁灭？”的根本问题，哲人对自由的问题的思考，就演变成人类世界里普通人对生命价值和日常伦理生活本质的质疑。当人通过生命力的展示与丰富的日常生活实践来宣告理性的胜利，当法律和国家治术等现代制度试图保障人的权利并逐步扩大人的自由范畴时，死亡的阴影仍在笼罩人类理性的上空。

对后人来说，古代先贤的墓碑上隽永的格言是对真实世界的一种无情告白，它丝毫改变不了活着的人所面临的自由的困境，也丝毫不能减轻后来者曾经和即将经历的肉身与精神痛苦。

技术作为人类理性的产物，一方面试图帮助人类自身超越人性中对外部世界脆弱的控制力，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将人的自由限制在技术控制的范畴。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被越来越多的人自身发展出的各种技术所影响和左右，因为技术时代的核心特征是理性的力量试图统治并征服自然与社会世界的不确定性，并最终发展成为主宰人类生活的强有力工具。

因此，为避免人类陷入自身设置的牢笼，人就有必要通过丰富道德与精神生活来再次点燃自由的篝火。毫无疑问，重返经典，阅读经典复活了当代人与历史先哲的对话，并有可能缩小人类总体的历史经验与个体真实生活之间的可怕鸿沟。通过阅读经典，现代人可以试图脱离技术理性的操控，通过沉思进入纯粹的精神活动境界。因此，阅读改善了教育的品质，也帮助人们摆脱堕落成为“现代野蛮人”的命运。

作为自然教育的一种最古朴的方式，人们日益坚信，阅读的社会功能在于培育自由的公民。而阅读经典不仅可以丰富我们沉思的生活，也是人类从“自然人”向“自由人”发展必然经历的文明实践，它最终帮助我们获得并重返自由。亚里斯多德说，美德即知识，他的理解延续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一贯的传统，其核心关怀是对“善为何？善何为？”本质问题的最简洁的诠释。古希腊学院风格的象征通过哲人的思辨与教育大众得以呈现，同时哲人个人的道德生活在不断实践智慧并赋予人以自由。与知识为伴，与真理为友，逐渐演变为大学和大学制度的核心目的。

正是通过赋予“美德即知识”的倡导，无数代知识份子和学人才能够获得思想的自由，并通过不懈的努力避免狭隘政治的介入影响独立的人格教育，使科学获得新生，并使知识增长成为可能，让人类向真正获得解放的目标迈出新的步伐。

人的自由本质上是在通向未来的途中对可能面临的种种不确定性所具有的能动性，它取决于人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如何在适应环境与改变自我的平衡中做出的努力与拥有的智慧。然而，人类的悲剧性在于，人从诞生那一刻起，人就无法回到原点，并无法改变通向死亡终点的宿命。在自然世界与现实社会里，人类冲突的根源没有因为观念、习俗和规则而改变。在“永别了武器”的宣言中，

人类从未实现康德宣称的“永久的和平”。

千百年来，在对生存与毁灭问题的道德拷问中，人类最终通过宗教获得了救赎。在涂尔干眼里，正是由于包裹于工业文明与技术理性的现代性的发展残酷撕裂了道德秩序的规范，而人的“失范”行为及其发展却最终促使宗教生活的实践具备了永恒的教育意义与道德功能。

就像卢梭在《爱弥儿》中体现的观念类似，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也同样认识到宗教生活与社会根源二者的联系，他指出人类理性的创造与道德的内省活动只有在科学与知识的范畴内才变得有意义。在涂尔干那里，我们不断得到教诲，社会是一个深邃的意义世界，因为那里体现了物质与精神世界最有力的组合。

从托克维尔到涂尔干，我们清楚认识到，个体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奠定了社会学知识的永恒基调。从马克思到韦伯，我们也同样明白一个道理，真实的人类历史和人类实践的历史性充满了价值与价值判断。韦伯在《以学术为业》的演讲中曾说，作为真实存在的不美、不神圣和不善，直接反映了不同信仰与价值之间的冲突。象韦伯这样的先哲一直都是我们同时代的人，他的思想的穿透力不断提醒后人，理性化力量的限制和人类命运的不可捉摸。在学术世界里，韦伯强调从善的终极目的出发，应本着良知，理智的正直诚实是美德，也只有基于这种美德，个人的学术的成就与科学事业的进步才有可能。

经典著作的重要价值在于它们可以帮助我们通过了解先哲们解读人类林林总总的实践与思辨，它们构成了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世界的智慧指引，并有可能削弱技术作为国家的敌人通过以自由的名义发动的、针对自由采取的种种侵害，技术的滥用和技术理性无以复加的泛滥是这个时代的最大难题与挑战，也是拷问人

类道德生活延续的基本问题。

在对人的本性问题的探讨时，中国古代先贤很早就提出了“性本善”的观点，这一点在“卢梭的问题”中也不断呈现。卢梭明确提出人本质上是善的，是“社会”让人变坏。从对“自然社会”基本问题的思考，迈向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并最终迈向追寻“人如何获得自由”终极问题的答案，历代哲人对人类伦理生活本质与形式的探讨，不仅是卢梭自然社会理论的核心所在，也是人类世界如何思考“人的自由”这一核心问题的出发点。

圣雄甘地曾指出，贫困是暴力的一种最坏的形式。如果甘地能见证当代社会的暴力形式，我相信他不仅会因世俗世界里思想的贫困而悲哀，也会被今天这个时代技术理性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所震撼。作为人，我们看到了技术对文明进步的贡献，但我们同样也饱尝了技术理性和技术统治导致的无知与浅薄，而这些同样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最可怕的敌人。正因为如此，当下的我们就要试图通过不断省察日常生活的道德意义，来寻求自由的真正内涵。

也正是因为阅读圣贤与哲人的经典著作，人们不断完善自我，减少无知带来的恐惧，在内心深处倾听自由的召唤。流传千古的经典著作中那些闪光的思想犹如夜空耀眼的星星，不仅为人类心灵黑暗世界点亮了一盏明灯，也驱逐了试图锁闭人类灵魂深处通向光明世界的恶魔。今天，网络技术的发展延展了人追求自由的触角，却分割了人作为自然人所能体验的真实生活。

今天的人类早已处于现代国家技术理性的包围之中，公民社会的兴起仍然有赖于家庭、教育和宗教等人类基本制度的延续与复兴。对当代国家而言，技术与治术的结合尽管提升了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的效率，也激活了选举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基层实践，但技术时代里理性化的强化与升级却不断在塑造重生的利维坦日

益复杂的野蛮性。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现代性的后果之一是超越时空的事件日益影响人类生活形式的重组与结构化，某种程度上它是现代性的暴力美学的体现。

同时，现代性的双重性一方面表现为，人的生活世界无时不在以不同形式呈现历史的隐喻，另一方面个体的真实生活也通过隐藏在历史经验里来投身对自我的反思，正是这种双重性或多或少地限制着人的自由的发展。

在今天这样一个喧嚣嘈杂的时代里，现代人需要的精神慰藉和道德生活的自省远远胜过物质的享乐与对技术的盲目崇拜。在物质不断填充人们的日常生活，当技术日益侵蚀人性的内心世界，我们极其需要认真照看好自由。通过反思技术时代的理性及其限制，通过重新阅读先贤的经典著作，也许我们可能重返自由的境界，正如歌德在《浮士德》中所说：

“精神界这个生灵，
已从孽海中超生。
谁肯不倦地奋斗，
我们就使他得救。
上界的爱也向他照临，
翩翩飞舞的仙童，
结队对他热烈欢迎。”

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我始终相信人性的美好。然而，我也时常被人性的复杂所困惑，如何深化对人性的理解，促发良知的进步，寻求善的意义和伦理实践，我以为这是回归生活的本质目的。通过阅读经典，通过理解并反思先哲们的

道德世界和伦理生活，我相信每一个人在当下都可以与现实世界的丑陋做一次短暂的告别。

通过阅读经典，通过理解伊拉斯谟在《愚人颂》中论及的愚人的智慧，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乐观的方式拥抱生活中的真善美，进而在寻找生活的乐趣中获得某种自由。正如哲人蒙田在随笔中所言，为避免身边的事物败坏我们的趣味和品性，人们应象自然社会中的“野蛮人”学习，在受自然法则的支配中保留人的淳朴状态。

阅读经典，也再次让我们意识到，理想国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差距有时会让人情不自禁想像自然社会的美好，并通过实践伦理生活的善的目的为实现人的自由做出不懈的努力。